

羅家倫的毀譽

(本文插圖刊第九頁)

● 金紹先 (大陸作家)

不談主義問題難解

羅家倫，字志希，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學者，北京大學畢業。他是「五四」運動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先後留學於美、德、英、法等國，獲哲學博士學位，他和胡適一樣，都是美國實驗主義「大師」杜威的門徒。一九二六年回國後參加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任蔣介石總司令部文職少將，此後，又轉入教育、學術界。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曾有一個短時期任武漢大學教授。這是我認識羅家倫的開始。

一次羅家倫作《歷史哲學》的講演，學生紛紛遞上紙條提問，羅很耐心地逐一答覆，記得我當時也遞上一紙條，請羅談談關於實驗主義在中國具體運用的問題，羅在回答時笑著說：「我研究過實驗主義，但是為何運用實驗主義來解決中國現實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我卻想也沒有想過。」說完便把紙條放置一邊，台下響起笑聲，我當時既尷尬又莫名其妙，心想羅的架子真是夠大的。不料事後羅派人來邀請包括我在內的幾名學生去他的寓所面談，他很誠懇地說：「你們提的問

題是很有意義的，但會場上又不可能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所以請你們來談。」我很感動，也就無所拘束地提出：「我認為胡適博士所說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便是實驗主義的具體運用，主張我們應該腳踏實地，有實用價值地來研究，諸如：人力車伏的生計問題，總統權限問題、妓女問題、農民破產問題……等等，而不要生吞活剝地空談西方那些五花八門的主義。」羅回答說：「但是我以為，如果不談『主義』又用什麼來指導我們解決這一個個的實際『問題』呢？」建國後五十年代的學術界在批判胡適思想時，我很有興趣地發現，不少批判文章的論點，與羅家倫當年說的這句話竟是一模一樣。

與胡適關係極親密

當然，絕不可能想像羅家倫會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批判胡適，他無論在私交上或是在學術、政治活動中，與胡適都有極親密的關係，他當時向我們申明自己的觀點：「我認為，我們中國人的大缺點之一，就是太講實用，太急功近利，缺乏西方人那種追求純粹真理的精神。胡適曾

說：『真理之所以為真理，就是它有用』，我個人對此不敢苟同。古希臘哲人探索宇宙的奧秘，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牛頓研究天體均衡運動的原理，在當時來說，何嘗有絲毫實用？他們只是為求知而求知，為探索真理而探索真理，唯其有這種精神，所以他們能進步，能昌盛，能最終得到『實用』之利。而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只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它一概斥為虛妄空談，其結果是以最無用的人股文章來滿足自己最實用的富貴追求，這樣的社會如何能進步？近世我們同西方文化接觸了，又震懾於其物質技術文明的先進，更誤認為西學從來尚實用，中學從來尚空談，這就更加助長了我們急功近利的老毛病，看見一樣西方的學說，馬上問它在中國有何實用。殊不知，倘若我們沒有一種追求純粹真理的精神，就是要想得到它的『實用』，也是不能的。」

科學玄學見解獨特

羅家倫當時並未同我們談及馬克思主義，但是勿庸諱言，他這種理論，同樣是反對研究馬克

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不過我以為羅家倫關於中國人從傳統上是過於講求「實用」，過於「急功近利」的說法，也有相當的道理。記得他當時曾簽名送給我他所著的《科學與玄學》一書，二十年代中國學術界以丁文江、胡適為首的「科學派」曾與張君勱、梁啟超為首的「玄學派」發生過一場熱鬧的論爭，羅家倫著《科學與玄學》，認為兩派之爭實屬無謂，科學與玄學（哲學）本來都是中國人應該研究探索的「純粹學術」，本身並不相悖，然而中國人竟會各執一端地打筆仗實在是對「科學與玄學」都並無了解所致，羅家倫的這一觀點，在當時的「科、玄之爭」中也可謂獨特。

獨來獨往招致妒忌

這次見面，羅家倫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誠摯謙遜，具有「純粹學者」氣質的人，不久他轉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成了國民黨內文化教育系統的「紅人」，與此同時，社會上卻普遍流傳一首對他進行人身攻擊的打油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力，三絕吹拍騙，四維禮義廉（謂其無「恥」也）」。當時大學師生，幾乎無人不知。我很詫異，因為我所見的羅家倫怎麼也不是這樣的人，所謂「一身豬狗熊」，是指其長相和身段而言，蓋近世中國文人，以南方人為多，大抵都是一副清秀白晰，斯文之至的形象，而羅雖是浙江人，身材卻較高而結實，一張古銅色的長臉，高顴潤頰，一具漏斗形的鼻子。後來我才知道，這首打油詩，乃出自於國民黨內部

「統」字號派系的手筆。羅家倫留學歐美多年，本與國民黨沒有什麼關係，北伐時回國，蔣介石愛重他的才學委以總司令部要職，此後又在蔣自兼校長的中央政治學校（國民黨黨校）任職，一度成為蔣的助手，因此他在國民黨內派系勢力的背景都沒有關係。（孔祥熙、宋子文、陳果夫、立夫兄弟軍統中統等），但因為直接與蔣聯繫，獨來獨往，此後出長清華、中大期間，據說又對「統」字號勢力不賣帳，因此招致他們的妒忌敵視，造出這首相當巧妙而又刻毒的順口溜，廣為流傳。

轉入政界考察西北

抗戰期間，羅家倫轉入政界工作，一九四三年他曾任西北考察團團長，赴陝、甘、寧、青海、新疆考察，由於我曾長期任職於蒙藏委員會，與羅家倫再度有所接觸，記得我曾譯出他剛出版的《新人生觀》一書請他簽名留念，並談及自己對黨政部門中種種複雜難處的人事關係，深為苦惱，說：「即使像先生這樣特立獨行，素著名望的學者，不也蒙受過許多無中生有的誹謗嗎？」羅沒有正面回答，只慨然一笑說：「在科學上，直線是兩點間最遠的距離。」他略為一頓，又說：「不過，我還是希望你不要走曲線這條終南捷徑！」事隔多年，我仍記得他這句寓意頗深的話。

羅在《新人生觀》一書中曾寫道：「政治本來是求公道的，是發揚真、善、美的，是使人性變得更加高尚的，然而，近來的政治，卻成為勾心鬥角，傾軋排擠，不擇手段，互相吞食的假的、

惡的，醜的黑暗場合。」我認為這是他帶著極度憤懣情緒的一種發洩，並非無的放矢的空論。

處境艱苦謹言慎行

一九四三年末，我奉派赴新疆工作，當時羅家倫任新疆監察使，但長期割據新疆的軍閥盛世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陽奉陰違，對國民黨派駐人員監視、限制、壓迫無所不至，甚至製造過將國民黨駐新人員幾乎全部逮捕的事件，在這樣陰惡的環境中，羅家倫處境的艱苦可想而知。我抵迪化（烏魯木齊）後即拜會羅家倫，他向我介紹了新疆特殊的政治環境，告誡我謹言慎行，以保證人身安全第一。他說：「我們中間有些人急躁冒進，企圖很快在新疆行使中央權力，結果反而壞了事。須知中央目前內外交困，對新疆用兵鞭長莫及，且在舉國抗戰的形勢下，亦不容如此，我們只有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精神，兢兢業業地工作，首先是不給盛世才抓我們，趕我們的借口，我們是代表中央的，我們在新疆的存在本身，便是向世人昭告著新疆是中國領土這個事實，我們的目的，是努力讓中央的力量漸漸地，持續地滲透進來，終有令盛世才不得為所欲為的一天！」

不談政治沉溺古董

羅家倫在新疆的確是如此自處的，我曾多次親眼見到過他與盛世才會見，吃飯的情景，一般是在接待朱紹良之類「中央大員」的小型宴會中，盛在表面上非常尊重他，總是把他安排為陪客

的首席，而他則唯唯諾諾，守口如瓶，絕不談論政治，有時談一些遊天池、南山、迪化八景等的觀感。詩詞，或談一些笑話助興，很明顯是事先作了精心準備的。他平日在寓所，給人的印象也是沉溺於古董文物的把玩鑒賞，他赴新未帶家眷，卻帶去不少古畫，我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在舊中國羅與王世杰都以古書畫的收藏鑒賞家聞於時，羅、王都是故宮博物院的常務理事。由於他知道王世杰與我是師生關係，他對我嘖嘖稱道王對古書畫精於鑑別，常觀察入微。他曾檢出一幅「清元濟自寫種松圖」給我看，卷後有戴本孝跋云：「寧種天上榆，寧栽海上桑，何必種松山之陽。」他說：「雪艇（王世杰之字）先生曾向我指出，『此卷戴題句中之二「寧」字皆有缺筆，乃避清宣宗道光號，戴在清初為遺民，不應有此」。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精辟的發現，我至今找不到答案」云云。最近我看到台灣談文物的一篇文章，說是羅夫人已把這幅畫捐贈故宮博物院，在戴跋後，加上了羅的《舟題》，前文詳述王先生的上述質疑，以及羅家倫無法解答的情況，接著懷疑，此卷得毋在道光朝後重付裝池時，表工曾動手術乎？展卷審視，此兩「寧」字腳下均見手術痕，於是釋然，此亦鑒賞中之趣事也。顯然這是羅離新或去台後「舟題」的，當我看到此文時，好像五十年前羅家倫展卷對談的情景，躍然紙上。他這樣對我談鑑別古畫且勿論；主要是他也經常以展玩古畫接待其他來客，其且的無非是要在盛世才及其手下人中造成一個印象：羅的確是一個無心於政治的學者型人物，因此

對他不十分警惕。

借機宣傳化解衝突

然而羅的「韜晦」之略並不等於無所作為，記得有一次我陪羅去參加維吾爾族群眾某宗教節日，羅同幾位維族代表人士很融洽地交談，他特別指出：「維吾爾族在中國各個較大的少數民族中，一向是最擁護中央的，在歷史上，如匈奴、蒙古、滿洲、吐蕃（西藏）等，當其強大時都進攻過中央，獨有維族不然，維族古稱回紇、回鶻、回鹘等，其實這都是「維吾爾」一詞不同的音譯，唐朝中葉，回紇的懷仁可汗控制了今新疆、內外蒙古及至東北的廣大疆域，強盛莫比，卻不僅未進攻唐朝，倒是派遣大隊騎兵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維護國家統一，此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僅見的，因此，中央也從來對廣大維族同胞懷有特別親切愛護的感情，在今天抗日戰爭的艱巨時代，我們期待維族同胞發揚平定安史之亂的光榮傳統，為國家利益作出貢獻。」我當時在一旁懷疑羅先生是否過於書呆子氣，這幾位維族人士連漢語都說得不大好，如何能懂得「安史之亂」，「郭子儀借兵」之類典故。不料這幾位維族人士不僅懂得而且很感動地表示，他們從小只讀過《古蘭經》，對本民族的歷史一無所知，很希望今後能多了解一些這方面知識，羅隨即對身邊一位盛世才的陪同人員說：「我要向盛主席建議，找一些通曉維語的人士，寫幾本這方面的維文讀物，向維族同胞作些介紹。」就這樣羅家倫既利用機會向新疆各族人民宣傳一種「中央感情」

，又以談古說今的形式讓盛世才抓不著什麼把柄。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國民黨黨軍隊逐漸入新的情勢下，盛世才終於告別「新疆王」的寶座，被蔣介石召往重慶，新疆這塊大好河山終於結束了自辛亥革命以後一直游離於中央政府之外的狀態，對此，羅家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滲透」和諧團結化解衝突之功是應該算在內的。

絕不輕視少數民族

盛世才倒台後，羅家倫即內返重慶，接著我就任新疆日報社長，他寫信給我，說他過去曾有一些吟詠新疆風物的詩詞發表在《新疆日報》上，囑我代為檢索寄給他。我遵照照辦。我手邊至今仍存錄有羅家倫當年遊天池的幾首詩：

(一)淡妝濃抹更相宜，西子湖光未足奇，知是瑤姬青鬢好，鏡中搖曳碧琉璃。

(二)玉顏閑抹晚霞紅，隔霧窺妝趣更濃，莫道藐姑無狡獪，忽如相避忽相逢。

(三)歌完黃竹玉悲哀，明鏡朱簾倦裡開，天上人間難再得，穆王何事不重來？

(四)白玉峯前翡翠池，天生佳麗鮮人知，錦茵鋪列雲杉幕，正是尋詩入夢時。又：勒馬回頭，看天池水光燦爛，彩色雜陳，不忍遽別。

玉簪散出拋家髻，舞罷猶披雲錦裳，掉轉馬頭重惜別，髮邊斜插「莫相忘」。

※「莫相忘」為歐美情花，以贈所歡，即紫羅蘭也，或譯「勿忘我」。

羅家倫回重慶後，根據他在新疆、西北地區



民國十一年羅家倫由美赴歐在船上留影。

的考察和工作經驗，寫成《新民族觀》一書，對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內的中國各少數民族作了大量的詳實的介紹，當時蔣介石氏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用大漢族主義的「宗族」一詞來稱呼各少數民族，羅家倫不得不在書中亦採用「宗族」之說，但他其實是不贊成這個詞的。抗戰勝利後，我卸任迪化市長回南京，在一次晤談中他曾說「宗族」這個詞「定義不明」，「易生歧解」，且與中山先生「各民族自由聯合」的遺訓不符。事實上，羅家倫對少數民族同胞不僅絕不輕視，甚至還認為他們具漢族所缺乏的許多優良素質，他非常贊美地回憶起維吾爾、哈薩克青年男女騎馬

馳騁的矯健英姿，惋惜地說：「我們漢人本來也是具有這等如熊虎一般的陽剛之氣的，試看杜甫寫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你看她是騎著馬，而不是坐著轎，更沒有纏小腳。公孫大娘舞劍「燿如羿射九日落，驕如群帝駭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我們今天看梅蘭芳演虞姬舞劍，連十分之一的氣勢都沒有。唐代婦女如此，男性可想而知。不料後來一天天的萎靡下去，如今人們竟把蒼白瘦削、油頭粉面的「小白臉」視為美男子，何其可悲！我過去多次批判「小白臉」的審美觀，卻招來許多惡毒的攻擊，我在重慶，每看見

那躺在滑竿上讓人抬著走的闊少爺便生氣，這樣的民族如何能振興呢？」這使我又一次想到這所謂「許多惡毒的攻擊」，是否指「一身豬狗熊……」而言呢！再想到羅在《新人生觀》中一再倡導「強者的生活」，「道德的勇氣」，「體魄的雄健」，倡導「恢復唐代以前的形體美的標準」，並專門批判「小白臉」說：「我研究古畫，見那歷代帝王國，大凡開國的君主，都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而每當「小白臉」嘴臉出現時，不是亡國之君，也離亡國不遠了！」這些，實在都是有所指而言的。

有良知的知識份子

一九四七年後，羅曾任駐印度大使。一九四九年去台灣，逝世於一九六九年。前不久，我與台灣友人會見，談起羅家倫任台灣國史館長時主張推行簡化漢字，羅家倫舉例說，繁體的「臺灣」二字多達三十八劃，為推廣教育，發展民族科學文化起見，這類繁複的漢字實有整理、簡化的必要。當時台灣方面正在大罵大陸文字改革是「毀滅中華文化」，因此羅家倫的主張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有人著文攻擊羅家倫與大陸中共「隔海唱和」。我由此感慨良深；羅家倫盡管從不以特立獨行為標榜，盡管每以「謹言慎行」忠告於人，但他的為人、為學、從政，終不愧為一個產生於「五、四」時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附記：本文是查閱倖存的當年筆記本資料寫成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寫於成都